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岁月篇

雪后红梅——哲学家孙叔平

战争年代

● 程 广 庆

孙叔平，安徽省萧县人。生于 1905 年 10 月 21 日，1983 年 12 月 24 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七岁上了私塾，在多年的学习中，他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勤学中国古典诗词和名人传作，早年就能写出简洁流畅的文章，注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幼年时代打下的这种功底，对于他后来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发生，1911 年在孙中山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封建复辟势力仍很顽强，社会变化甚微。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波及全国，这时私塾被关闭了，孙叔平进了本乡的高等小学读书。

作者原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军职教员。

在新的学堂里，他学到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清除了许多陈旧观念，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1921年，孙叔平高小毕业，考入江苏第二中学（即今苏州中学），被编到理科班就学。那时他埋头勤奋读书，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1923年，孙叔平初中毕业。因家道衰落而休学，回乡当了一年小学教师。这一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接触了当时的一些革命工作者，他们给他讲了中国的现实和出路，讲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指出政治问题不解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是空话。他又目睹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地方豪绅的横行，激起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思想。

1924年，孙叔平又回到江苏第二中学高中部读书。当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初期。一首“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在中国大地上流传。这时的孙叔平，已不安心于在学校作化学、物理实验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再有兴趣埋头于数理化学习，而转向文学，想用文学来唤醒民众，挽救中国。

同年9月，爆发了“江淞战争”。直系军阀孙传芳和皖系军阀卢永祥部队在嘉定、太仓地区对阵，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他面对这样的现实，虽还在读书，但国家的命运如何，个人的前途如何？不能不进行思考。“中国往何处去？”成为孙叔平经常思索的重要问题。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道路摆在他面前。此时代表不同思潮的刊物和书籍，如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国民党的《觉悟》、共产党的《向导》、共青团的《中国青年》成了他日常不可缺少的读物。他慎重地思考着，对照现实，进行比较。最后终于选择了拥护国共合作，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道路。

1926年，孙叔平高中尚未毕业，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外语系。此时，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5月，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北伐军胜利进入长沙，吴佩孚节节败

退。8月，北伐军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吴佩孚调集主力，拼死抵抗，双方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北伐军终于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直逼武汉。9月，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北伐军取得了攻克武昌的胜利，武汉解放了。这一胜利的革命形势使孙叔平很受鼓舞，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以为中国从此将走向光明，他可以在大学里安心读书，学习外国文学了。学校在寒假里登了开学广告。年底，他不顾长江下游尚在孙传芳控制下的危险，只身前往武汉。到达武汉后，他被大革命的浪潮所激励，积极投入到学生自发组织的革命活动中去。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孙叔平阅读了郭沫若等的《请看今日的蒋介石》一文，给他指明了方向。他仍然坚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否则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他拥护武汉的国共合作，渴望能够重新出现一个好的革命局面。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天天上街宣传革命。在学校，一有空他就抓紧时间阅读英文小说、诗歌，学习自己的专业。不过，在这种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下，能不能学好专业？他并无把握。而眼前的政治现实又使他不能不关心革命理论。当时有两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一本书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另一本书是布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这些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由此而继续学习，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所吸引，逐渐地变成信仰，从此终生离不开它了。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孙叔平看到共产党挽救革命的“八一”南昌起义、叶贺南征、广州起义，虽然未能取得理想的成功，但也看到了新的光明，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这使他由悲愤转而为愤激。他不顾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仍与同学结队上街游行，声援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久，学校被包围、搜查，他的同学多人被捕、杀害，他也被大兵赶出了学校。轰轰烈烈的革命失败了，但是他相信中国革命仍会继续下去。他决定放弃学籍，

回到家乡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初，孙叔平回到萧县参加了党组织。从此，他开始了在徐州地区进行五年艰难的白区地下工作。1929年8月，孙叔平被派到睢宁县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了睢宁特别支部，孙任书记。1930年4月，重建睢宁县委，孙叔平任县委书记。

1930年春，为执行立三路线，发动农民暴动，经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徐州、海州、蚌埠特委。孙叔平由睢宁县委书记调特委任秘书。特委所辖包括苏、鲁、豫、皖二三十个县和两个煤矿。当时组织暴动的方针是：“秘密准备，突然袭击”。7月，红军占领长沙以后，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立即动手。徐海蚌各县大都发动了暴动，但很少成功。这种暴动可以说是胜利易，失败也易。而失败之后，上级领导则批评为“右倾”，要继续再干，再失败。直到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停止暴动的指示下达后，这种“左”倾暴动宣告终止。

1930年冬，江苏省委认为徐海蚌特委太大了没有必要，为了接近基层，分成徐州、海州、蚌埠三个特委。孙叔平在徐州特委工作。1931年春，孙叔平等同志请求取消徐州特委，建立铜山、宿县、宿迁三个中心县委，深入下去，进行工作。省委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孙叔平任铜山中心县委书记。在此后的一年里，孙叔平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脚踏实地做了一些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领导一些小规模的日常斗争，很有成绩，发展很快。

1932年春，王明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又要发动暴动了。为了组织王明路线的暴动，1933年夏，又经江苏省委决定，合并铜山、宿县二个中心县委，成立新的徐州特委。孙叔平又到徐州特委参加领导工作。这次组织暴动的方法仍然是“秘密准备，突然袭击”。他们曾提出怀疑，这不还是立三路线吗？答复是：这样的做法在1930年是错误的，在1932年就是对

的。这个“辩证法”一下子就把他们压倒了。于是在1932年春末在铜山组织了“周圩子暴动”，在睢宁组织了“曲头暴动”，在宿县组织了“古镜集暴动”，在萧县组织了“张庄寨暴动”。当时这些暴动和1930年组织的那些暴动很相似，即暴动成功很快，但失败也很快。这种暴动轻易地胜利、而又轻易地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孙叔平他们认定，组织这样的暴动是不对的，不能再这样干了。但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领导，坚持认为发动这些暴动的做法是对的，失败的原因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说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给加上一项“富民路线”的帽子。此时，孙叔平深感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但在他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抵挡不住，还是跟着干，结果失败得更惨。

1932年11月，徐州特委书记被捕，孙叔平代理特委书记。此时徐州地区的党组织，开始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933年夏发生了总的破坏，从特委到各县，所有的党团组织，几乎被破坏光了。

1933年春，徐州特委和省委恢复了联系，由孙叔平到上海汇报情况。经省委决定：孙叔平即调上海，另指定三位同志负责徐州特委工作。孙回徐州，传达了省委决定，但因同省委联系中断，不能成行，只好留在徐州和新组成的特委一道工作。当时环境紧张，居无定处，那些叛变干了特务的人，积极协助警察进行搜捕。7月，孙叔平不慎被捕入狱。

1935年，孙叔平出狱后，目睹中国的现实，民族的危机，社会的黑暗，使他比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回到书斋里做学术研究的幻想被打破了。为了吃饭，他在丰县中学谋了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业。这使他除了吃饭之外有能力购实英文本的马克思著作，使他能够继续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学习马恩原著，他又自学了法语，增强了阅读

各种文本书籍的能力，这也为后来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了准备。在这所中学里，他团结了一些进步学生，不露声色，不多张扬地进行工作，启发青年向往革命，工作做得是很成功的。这些学生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多数成了游击队，建党、建政的骨干分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就在南边打进沪宁、蚌埠，北边打到台儿庄。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孙叔平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和他的老同志、老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此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成立，台儿庄会战开始了。孙叔平他们在动员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动群众，讲抗日民主道理，也组织了若干武装，并在国民党散掉了的区乡建立了抗日政权，支援台儿庄会战，并准备一旦沦陷就地打游击。

1938年5月，徐州、萧县沦陷。当时局面十分混乱，除挂太阳旗的维持会外，土匪蜂起，以抗日名义抢掠拉票。还有地主的联庄会称霸一方。日军的烧杀淫掠，激起了民族仇恨，也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某种“恐日”情绪。这时，人民需要宣传，需要组织，需要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孙叔平和刚从监狱里出来、已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的同志一起，还新联系了一些有志于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同志，着手组织队伍。开始只有几支枪，就被土匪缴掉了。然后又七拼八凑组织了十来支枪，仍不敢独立活动。到枪支多到能独立了，才敢出来活动，揭起抗日游击队的旗帜。这样由小到大，终于建立了一支能够抗击日、伪军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后由孙叔平等两同志带领，到陇海路北沛县同其它几支抗日武装部队会合，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随后又打了一些胜仗。这支有数百人的部队纪律好，能宣传，也能打仗，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牺牲精神终于为人民所承认。冬天，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司令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到了沛县，这支部队又去会师，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主力，一部分回萧县就地坚

持抗日。

1939年春，萧县地区的抗日局面有了很大发展。孙叔平和党内的同志协调工作，积极努力，办成了许多事情。比如，整顿县政、建立县政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区、乡也建立了政委会。这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参加的成员有共产党员，有农民，有进步知识分子，有青年，有开明的士绅，使抗日民主政权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就是成立县常备队。还有就是办农会干部训练班、开干部会、士绅会，宣传《论持久战》理论。这样到夏天，萧县的抗日力量进入到全盛时期，正式部队有五千余人，区、乡队在所不计。农教会、妇教会、儿童团遍及全县，群众斗志昂扬，敌人不敢进入腹地，人心之齐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冬，萧县党的关系转到了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所在地区豫皖苏边区。孙叔平奉调离开萧县。

1940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在豫皖苏边区成立，这是新四军华中地区创办的第一所抗大分校。开学后，孙叔平到校任教，主讲中国革命运动史。他的理论素养、实践体验和教学风格，深得全校干部学生赞佩。9月，第一期结业后，孙叔平调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原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和黄克诚领导的南下八路军组成）政治部任民运部部长，主管部队的群众工作。

1941年9月，孙叔平再次回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开始，担任由八十余名营团干部组成的上干队教育训练工作，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和哲学。10月底，任训练部副部长，管全校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工作。

孙叔平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比较来说，稍稍离开了火热的群众斗争环境，这使他再度有机会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到训练部任职，在随后的几年里，除了讲课和处理日常的教育

行政工作外，余下来的时间就是读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原译《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斯大林选集》和《联共（布）党史》等一大批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孙叔平以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体会，来消化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同他所讲授的中国革命问题结合起来，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理论教育的大众化。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1942年—1944年，按照全党的统一部署，抗大四分校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这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孙叔平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精心阅读党中央发布的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特别是回顾自己五年白区工作的惨痛教训，对于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思想根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时候，孙叔平同志已经深深地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根基。

1944年8月，孙叔平任训练部长。

1944年12月，学校实行机构调整，训练部和校部合并改为校务部，孙叔平任校务部长。这样，他既管教育训练工作，又要管行政和供给、卫生工作。尽管如此，他在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学校各项行政工作后，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努力抓好教育工作，特别注重培养教职学员的优良学风。在抗大四分校，孙叔平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他是一位很受人们崇敬的理论家和领导者。

1945年3月，孙叔平任抗大四分校教育长。此时，抗日战争已接近最后阶段，这所学校在六年内为豫皖苏边区和苏皖淮

北地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在教育工作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培养了一批能力和素质都比较强的办学干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孙叔平调离学校，派往淮北路西原豫皖苏他原先工作的地区，协助整编地方部队。

1946年5月，孙叔平调华中建设大学任教务处主任。华中建设大学是华中解放区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而特别建立的一所新型学校，成立于1945年春，停办于1947年秋。学校先在安徽南陵县新浦镇创立，后迁至江苏淮阴。由于内战爆发，1946年6月淮阴被炸，学校又向山东迁移。为躲避敌人追击，一路行军长达半年之久，于1947年春才在山东海阳安定下来。虽然华中建设大学存在时间不长，但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分四期培养了5000多名干部和知识青年，为新中国的建立输送了大量人才。孙叔平在建大工作期间，不仅担任一定的行政领导工作而且还开设了《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他上课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没有一句重复。学员们都为他渊博的学识、富有说服力的论据，以及讲课内容的有机联系而深深折服”（《华中建设大学校史》第189页）。当时的学员一致认为，上课最多，教学效果最好的就是孙叔平了。

由于建大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成分十分复杂，因此开展思想教育，让他们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革命理论，就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孙叔平针对学员来自各方，对时局有不同认识等状况，作了“新的学习环境与新的学习方法”、“学习与检讨”等一系列大型报告，帮助学员提高政治觉悟，认清形势。

孙叔平在“新的学习环境与新的学习方法”的报告中指出，“在进步的环境中，我们的学习可采取进步的方式。新的学习方法不是死读书，而是要理解，要运用思想，开动机器，用批判的态度去研究和体验事物，切不可盲从。所以要建立一种新的学风，

这是很重要的。”

针对学员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和团结问题，孙叔平又专门作了“学习与检讨”的报告，帮助大家正确地认识与解决思想问题。他认为，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是有特点的，这就是“既要有思想自由，又要有思想指导。思想是不能压制的，旧的要新的克服和扬弃，不能把旧的囚起来，也不能抱成见，而是要开展讨论，让新、旧观点来斗争。如果只有自由思想，那是自由主义不负责的态度。如果只有所谓的思想指导而不准自由讨论，那就是法西斯的统治教育。”孙叔平提出的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辩证结合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思想教育方法。这种对事不对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让学员们通过分辨是非，弄清对错，心悦诚服地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

为了进一步帮助学员提高思想认识，孙叔平还指出“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聪明的人只是不犯大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能够及时认识和改正的人。谁能指出我们的错误和提高我们的认识呢？那就是群众，要开展群众性的讨论，和群众交换意见。我们应养成虚心考虑和吸取群众意见的作风，不对的就改正，认识就提高，就有进步。这也就是民主的作风，民主的检讨。”检讨什么呢？孙叔平认为：“（1）与群众的关系；（2）与同学的关系；（3）与学校干部的关系。既要提意见，又要听意见。”通过检讨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认清了时局，可安心学习；第二，使学校的教育计划更能针对学员的要求；第三，加强团结友爱，建立必要的学习生活秩序。”这次报告以后，学员们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运用民主的方法，开展“民主的检讨”，既统一了对时局的看法，树立了为祖国的解放而献身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学习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协调了学员之间的关系。

为了做好学员思想政治工作，孙叔平还经常下班级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在讨论中，他一般先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再作

总结。据当时的学员回忆，孙叔平在做讨论总结时，一般都是采用“评论多种看法，摆事实、讲道理，以正确的观点来统一认识。大家都爱听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使人口服心服。”（《华中建设大学校史》第193页）因此，只要学校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派他出来。孙叔平通过和风细雨式的谈心，理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指出解决的方法，不仅解决了学员中出现的种种思想问题，而且在学员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

在建大离开淮阴向山东撤退的过程中，许多学员出现了不理解、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思想，于是，孙叔平又专门作了形势报告，通过分析形势，告诉大家撤退是暂时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战略上的转移。他针对部分同志故土难离，不愿去山东的想法，鼓励大家要放开眼界。他举例说：“过去我们用淮南币，现在要用华中币，这还是个小天地，要学会用全国通用的货币，才能走遍天下。我们不能只抱住淮南币，跳不出小天地。”这番话大大开拓了大家的眼界。

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战争打响后，孙叔平重返部队工作。1947年3月，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科学学校副校长（校长由特纵司令陈锐霆兼任）主持该校工作。

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要求我军从单一的步兵向多兵种过渡，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创建特科学学校主要是为我华东野战军新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培养技术干部。孙叔平到特科学学校任职，以他多年的办学经验、领导才能和思想智慧来执行这一新的任务。当时，办好这所学校，一是如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从解放区招收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基层干部培养成为特种兵部队的技术骨干；二是改造被我军解放的国民党特种兵部队的大批技术军官、专家和其他专业技术干部，研究编写适合于炮兵作战使用的教学教材，以及各特种兵专业技术、战术教材，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的

教学实践、战场实习和吸收部队作战经验，形成一定的教学规范。这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上总结出办好这类军事技术学校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战争急需的特种兵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大军渡江，特科学学校进驻南京汤山。不久，孙叔平调离特科学学校，到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参加接管高校工作。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孙叔平在教育战线和理论战线上又踏上新的征途。

1999年8月

解放初期在南京大学

● 管致中

1949年5月，原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组建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的校务。9月孙叔平同志担任军代表。后来，孙叔平又曾一度在市文教委员会高教处工作，一直和南大保持着联系。1951年下半年南大改行校长制，孙叔平任副校长。

孙叔平初来学校时，穿一身土布草黄军服，有军人气概。他虽为人随和，但讲话不多，与人谈工作时，总是抓住要点，言简意赅。南大校委会成立后，一切校务均由校委会主持，重大事情则直接向市文教会请示。孙叔平作为军事代表已没有什么具体任务，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并领导学校的政治理论学习。解放初期，广大师生急于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了解共产党的

方针政策，学习热情很高，在校、院、系各级都建立了学习组织。理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两大内容各分若干单元，每单元大多由孙叔平作启发报告，经过学习和小组讨论后，再由他作一个系统的单元小结报告。在学习过程中，也还经常请一些专家就某一专题作报告。后来，孙叔平又为文科学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在当时学校的教师中还没有人能开出这样的课程。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1950、1951年时，还有不少政治运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另外还有临时冒出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之类的任务。所有这些运动，都要组织师生学习，孙叔平又少不了要做动员、总结等报告。

孙叔平外表是军人样子，朴实端庄，做起大报告和讲起课来，则侃侃而谈，俨然一副学者风范。他有其特有的讲话艺术，无论是大报告或课堂讲课，都内容丰富，有系统的理论，也能联系实际，并且引经据典，包括很恰当地引用一些古诗文；讲解时，口齿清楚，条理分明，逻辑严密，非常具有说服力。因此他在师生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很钦佩他的博学，这可能是后来委派他为南大副校长的重要原因。总之，在解放之初，党领导和组织了南大师生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使大家提高了觉悟，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分清了敌我，这当中，孙叔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孙叔平正式参与南大的领导工作是在他1951年7月担任副校长后开始的。对于南大，孙叔平并不陌生。但南大是一个“统战环境”，学校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校、院长和系主任都是党外教授，且大多是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孙叔平作为党员副校长，一方面要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各方面的关系，每一较大的事，都要先在党内和民主党派内取得一致，

然后与干部、群众取得一致。南大又是一所学科面很广的高校，谁也不可能通晓各系科的专业。此外，除了学校本身的工作外，市里还经常布置一些任务，如毛泽东教育思想学习、保密学习、订“爱国公约”之类。所以在到任初期，他在党的组织生活中谈及感到工作很吃重、很费力，但也没有速成之方，一定要不缓不急好好干下去。

1951年，南大院系已作了些局部调整，根据上级决定，将医学院连同附属医院划归解放军建成为军医大学。在校内，教学上进行了课程精简与改革，除了新开设一些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外，还对原有各系的课程进行了删繁就简、突出主干等改革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潘菽校长在领导。孙叔平着重在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上，先后为学生正式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他一方面自己写讲稿讲课，一方面选拔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承担了新中国第一代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

孙叔平从1951年夏起担任副校长，在南大除了进行常规的教学工作外，最大的事件是“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根据南京市委部署，南大“三反”运动在1952年1月至3月底进行。开始时侧重在反浪费，揭露了不少铺张浪费和公私不分等现象，接着就转入反贪污、打“老虎”的运动。孙叔平在各种会议上反复讲清“三反”运动的意义和交代政策，他亲自听取汇报，掌握运动进程。在运动最紧张时，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各部门负责运动的党员干部研究情况和讨论下一步做法。在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逼、供、信”一类的过激行动，还曾打出了一窝假“老虎”。但在他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思想指导下，都能及时纠正，实事求是地结案，有关人员亦都得以解脱。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华东地区是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统一部署的，南大于3月下旬紧接着“三反”运动后开